

制度、技术与增长

——Daron Acemoglu的制度研究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启示

贺茂斌¹, 刘哲汝¹, 张 彬²

(1.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2. 山东省枣庄市峰城公证处, 山东枣庄 277399)

摘 要: 2024年10月14日,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 James A. Robinson因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社会繁荣影响的研究而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梳理了Daron Acemoglu关于制度、技术与增长关系的主要观点, 分析了包容性制度和偏向性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以及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 本文以构建包容性制度为核心, 从强化制度供给、推动制度创新、加强政策引导和坚持协调发展等角度提出完善新时期科技创新的路径和机制。

关键词: Daron Acemoglu, 包容性制度, 偏向性技术, 科技创新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完善科技创新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 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这进一步凸显了

制度创新在科技强国战略中的重要性。

制度作为社会的基本规则和组织形式, 对技术的引导和规范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 制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框架, 引导技术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 制度对技术的滥用和负面影响进行规范和约束, 保障技术的健康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数据隐私保护制度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完善。同时, 新技术的发展也为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空间。例如, 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为信任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促进了金融、供应链等多个领域的深刻变革。此外, 制度也通过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规则来维护经济增长的有序进行。

在此背景下,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最新理论,

作者简介: 贺茂斌,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讲师, 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科技智库。

刘哲汝,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与教育。

张 彬, 山东省枣庄市峰城公证处, 中级经济师, 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项目来源: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 FRF-TP-22-068A1)。

关注制度、技术与增长的关系，对于探索新时期建设科技强国的路径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2. Daron Acemoglu简介

2.1 身后有位“孪生兄弟”

Daron Acemoglu是一位美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他于1967年9月3日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的父亲Kevork Acemoglu是一名商业律师，而他的母亲Irma Acemoglu则是一位小学校长。出身于书香门第让Daron Acemoglu自幼就接受当地优质的教育。

1986年，Daron Acemoglu高中毕业后赴英国约克大学求学，于1989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并于1990年获得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按照惯例，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会由三到四篇论文组成，而Daron Acemoglu的博士论文中则包括了七篇论文。并且，根据其学位评审委员会成员James Malcomson的评价，即使这七篇文章中水平最低的那一篇，也足以让他获得三个博士学位^[1]。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一年后，1993年，Daron Acemoglu加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陆续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2000年晋升正教授。2006年，他被聘为麻省理工学院“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讲座教授（Charles Kinderberger Chair Professor）”。2019年，他被聘为麻省理工学院校聘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主要讲授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增长导论等课程。

根据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RePEc）的数据，Daron Acemoglu在2015年被评为过去十年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2]，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让哈佛大学N. Gregory Mankiw教授在博客中打趣道：“Daron Acemoglu一定有一个孪生兄弟在帮他写东西。”^[1]

2.2 第一届“舒尔茨奖”获得者

Daron Acemoglu大部分研究的动机是探究贫困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2001年，Daron Acemoglu等在研究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时指出，不同殖民政策导致不同制度形成^[3]。一种极端情形是，欧洲殖民者建立“攫取性政府”，如比利时对刚果的殖民，这些制度不保护私有产权，也不监督和制衡政府掠夺，以最少投资，尽可能从殖民地转移资源。另一个极端，许多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搬用欧洲的制度，强调私有产权及监督和制衡政府权力，建立“新欧洲”，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2002年，Daron Acemoglu等进一步提出“财富的逆转”现象，即过去相对富裕的国家现在反而相对贫穷^[4]。例如，1500年左右的印度莫卧尔、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比当时的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繁荣得多，但现在后者的发展水平反而超过了前者。研究指出，是制度因素而非地理因素造成了“财富的逆转”。“制度的逆转”通过影响工业化进程进而导致“财富的逆转”。早期工业化时期，需要广大民众参与投资，而保护产权的制度更适合这一发展趋势。相反，攫取性制度因为害怕大众威胁少数精英的既得利益，从而阻碍了工业化进程。2012年，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5]一书中提出国家间的发展差异完全源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共同研究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通过统计分析和计量研究方法验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2019年，在《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6]中，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提出，只有当国家的权力与社会的力量达

到大致平衡时, 自由社会才能实现。一个国家形成了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组合, 这种组合就可能产生路径依赖效应。要改变这种组合, 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 在制定经济政策时, 必须考虑现有制度组合的利弊, 以避免陷入路径依赖的困境。

2023年, 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在《权力与进步: 技术与繁荣的千年斗争》(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7]一书中指出, 技术进步并不总是自动带来社会繁荣, 而是可能加剧不平等。作者以工业革命为例, 提出虽然技术提升了生产力, 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反而下降。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上认为技术进步会自动提高所有人生活水平的看法。技术选择并非单纯的技术决策, 而是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博弈。控制技术选择的精英往往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忽视了普通工人的需求。当代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中, 技术进步继续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高技能工人的收入增加, 而低技能工人则被边缘化, 导致社会分层的加剧。因此, 为了实现真正的社会繁荣, 技术进步需要在设计和应用中考虑更多的社会公平, 而不仅仅是提高生产力或降低成本。

在学术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 Daron Acemoglu也荣获了众多学术荣誉。2004年, 获得美国劳动经济学会的最高奖“沙尔文·罗森奖”(Sherwin Rosen Award)以及芝加哥大学为纪念“人力资本概念之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设立的“舒尔茨奖”(T. W. Shultz Prize), 成为“舒尔茨奖”获奖第一人。2005年, Daron Acemoglu获得具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此外, 他于2006年受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13年受聘土耳其科学院院士, 2014年受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3. Daron Acemoglu关于制度、技术与增长关系的主要观点

Daron Acemoglu在延续了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强调了制度、技术、人力资本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他主要学术观点广泛论述于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5]、《狭窄的走廊: 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2019)^[6]、《权力与进步: 技术与繁荣的千年斗争》(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2023)^[7]为代表的众多著作与论文中。

3.1 制度与经济增长

早期经济学家通常将经济增长归结于物质资源等禀赋的增加, Daron Acemoglu等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复杂的计量分析, 推翻了“物质资源决定论”“地理决定假说”, 提出并验证了“制度决定假说”^[3]。他们选择非洲殖民地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比较输入制度的国家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来验证制度的作用。如果殖民者认为某一地区不适宜生存, 则会实行攫取性的政策。研究发现, 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即坏的制度(攫取性制度), 造成殖民者死亡率升高, 从而验证了制度的重要性。Daron Acemoglu等还讨论了拿破仑战争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 在拿破仑战争后, 一些国家原有的封建制度被摧毁, 引入民主、法制和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表现出更好的经济增长, 而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封建制度的国家经济却保持长期低迷。

Daron Acemoglu在证明了好的制度确实有助于经济增长之后, 又试图找出制度本身的演化规律。他不同意新制度经济学开创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提出的“政治科

斯定理”，即当一项制度使一部分人获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时，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并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Daron Acemoglu认为，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并将“政治科斯定理”在现实中的不成立归因于第三方保证机制的缺乏^[8]。由于保证机制的缺乏，政治市场上各集团的冲突和制度的不稳定成为常态。

3.2 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第一，技术进步并非一定能带来普遍性繁荣。Daron Acemoglu等通过对内生生产网络模型的分析指出，技术进步通过投入—产出联系扩散并降低价格，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技术变革的推动作用的实现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依赖于制度的支撑和保障。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的教育体系以及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技术变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9-10]。工业革命显著提升了生产力，但工人的待遇并未随之改善，反而工作条件恶化。直到工会兴起和政策改革后，工人的生活才逐步改善。这一观点挑战了“技术乐观主义”的普遍看法，即技术进步会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

第二，技术进步具有一定偏向性，并将加剧不平等。Daron Acemoglu认为，技术进步并非中立，而是会偏向某一生产要素，进而影响该要素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Daron Acemoglu基于Dixit-Stiglitz (1977) ^[11]模型，提出了“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12-13]。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受经济因素影响，存在偏向性，造成某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提高相较于其他生产要素更快，从而导致该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相对减少，这可能改变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格局。Daron Acemoglu也对技术进步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表示担忧。高技能者会首先掌握新技术并从中获益，而低技能者则可能因技术而受

损，导致收入分配恶化。随着更多人为了使用新技术而提升技能，技术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偏向高技能者，从而持续扩大收入差距，推动社会向不公平方向发展。Daron Acemoglu和Pascual Restrepo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14]。他们指出，技术变革虽然推动了生产效率提高，但也可能带来不平等加剧。技术进步不一定导致劳动与资本分配不均，但如果技术进步倾向于取代人力而非增强人力，就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形成行业或平台垄断。Daron Acemoglu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会成为将财富和权力从普通人转移到一小群科技企业家的方式^[15]。因此，他强调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需要关注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减少不平等。

第三，技术进步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环境。Daron Acemoglu和Pascual Restrepo认为，技术进步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力，其实际效果取决于制度如何调控技术的应用和扩散^[14]。因此，在强调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环境，以确保技术进步能够真正造福于人类。

3.3 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包容性制度指的是一种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机会、保障权利以及鼓励创新的体制。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认为，包容性制度的核心特征包括确保个人和企业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有效的法律框架，确保合同的履行和纠纷的解决，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5]。

相反，攫取性制度由少数精英阶层控制，他们通过权力寻租和资源掠夺来维持自己的利益，通常表现为政治腐败、法律不公和资源配置扭曲，并通过抑制创新、导致资源错配、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创新带来的收益可能会被精英阶层通过不正当手段占有，因而攫取性制度下的创新活动往往

受到压制。

Daron Acemoglu等进一步将制度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认为政治制度和初始禀赋决定经济制度，进一步决定经济绩效^[16]。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5]一书中，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研究了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过程，认为制度变迁可以是渐进的，也可以是革命性的。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差异主要归因于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不同。他们根据制度的包容性和排他性特征，将政治和经济体制分为四类：包容性政治体制配合包容性经济体制、包容性政治体制配合排他性经济体制、排他性政治体制配合排他性经济体制，以及排他性政治体制配合包容性经济体制。研究指出，包容性体制有助于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排他性体制虽然可能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却无法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

在《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6]一书中，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历史案例，展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的长期发展和自由的实现。包容性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攫取性制度则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经济停滞。

3.4 自动化与劳动力市场

Daron Acemoglu和Pascual Restrepo通过模型探讨了工业自动化对美国就业领域的影响，结果显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自动化的广泛应用显著降低了就业率和工资标准^[17]。还指出，劳动力的稀缺性是否促进技术进步取决于技术是替代还是补充劳动力^[18]。Daron Acemoglu等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新定义劳动市场，尤其是中等技能劳动者正面临自动化的巨大挑战，接触人工智能的企业减少了非人工智能职位的招聘，并改变了工作所需的技能^[19]。Daron Acemoglu等也进一步使用任务模型分析了自动化如何影响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

距，指出尽管自动化提高了生产率，但可能降低受自动化影响工人的工资^[20]。Daron Acemoglu等还探讨了技术变革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发现自动化减少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比重，而新任务的产生对劳动需求有积极作用。通过多种模型和实证数据，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对劳动市场和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21]。

人工智能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而Daron Acemoglu对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持怀疑态度，他根据Hulten定理，预估十年后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上限不超过0.66%，对美国GDP的总促进作用最高也只有1.56%，他认为，只有人工智能自动化能达到40%时，生产力才会显著提高^[22]。此外，用机器取代人工并不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唯一途径，确保人工智能是与劳动者形成互补也是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路径^[7]。

3.5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

2013年12月19日，Daron Acemoglu在北京参加“经济学发展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并作题为“The Future of Chinese Growth: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的报告^[23]。他指出，经过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给人民提供了巨大激励和机会，不断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中国的经济增长结合了市场化改革与精心设计的国家干预，这种混合模式使得中国能够在保持经济自由度的同时，也通过政府干预来适应其历史、文化和国情等方面的特点。

他强调，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微小的行业进入壁垒或影响公平的管制都可能阻碍新想法和发明的企业与现存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影响创新。同时，包容性政治制度也保证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更加平等，防止政治权力为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所垄断，并保证经济制度的长期平稳运行。

同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引擎虽然不

难理解，但未来的挑战也非常严峻。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相对高水平的、富余且廉价的劳动力，但这种赶超之路不能永远走下去。当人均GDP达到世界经济前沿国家的35%~50%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一些国家还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为了跨越这一陷阱，中国需要实现从赶超式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转变。

Daron Acemoglu对于中国跨越到更高经济增长阶段信心十足，但认为最终走到更高阶段的关键还在于包容性的顶层设计和经济制度的改革。

4. Daron Acemoglu的研究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启示

Daron Acemoglu的研究，强调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包容性制度能够促进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而攫取性制度则会抑制创新、阻碍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对于构建我国科技创新的路径和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4.1 强化制度供给，激发创新活力

包容性制度能够激励创新活动，促进技术扩散。因此，强化利于创新的制度供给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第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知识产权立法，根据时代发展需要，针对新兴领域和特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时修订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地区的执法协作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成本更低的维权渠道。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鼓励权利人积极维权。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和谈判，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第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增加财政科技投

入，逐步增加科技投入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确保科技投入能够满足科技创新的需求。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通过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等方式为科技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和创业投资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并对符合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产业政策的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加强科技创新平台的软硬件建设，特别是大科学装置和交叉学科平台建设，鼓励科技创新平台向社会开放共享科研设施、仪器设备和数据信息等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平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跨领域、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形成科技创新的合力。

4.2 推动制度创新，助力技术扩散

制度变迁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我们应积极推动制度创新，为技术扩散创造有利条件。

第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打破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创新活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创新资源的统筹形成协同高效的创新资源配置体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进科研管理机制改革，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建立以创新能力、价值、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拓宽科研人员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通道。

第二，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优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顶层设计，建立科技开放合作战略政策体系。制定清晰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明确合作方向、重点领域和优先事项，确保科技合

作与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科技发展趋势相契合。搭建创新平台, 拓展科技领域开放合作广度深度。依托进博会、广交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世界机器人大会等行业类的国际知名展会平台, 加强前沿科技成果、科技产品的交流互鉴, 拓展科技合作广度。在“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等机制下, 与海外一流大学、研发机构、高科技企业共建联合研究机构、科技园区、数据共享平台等, 深化实质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拓展科技合作深度。

4.3 加强政策引导, 促进科技经济融合

政策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应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 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第一,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支持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鼓励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创新,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完善人才政策, 制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政策措施, 包括薪酬激励、职业发展、生活保障等方面。优化人才结构, 根据不同领域和行业的需求, 合理配置人才资源, 提高人才使用效率。加强人才培养, 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 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人才培养合作。

第二, 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将科技经济融合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 明确目标和方向, 并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需求, 选择具有战略意义和市场前景的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加强政产学研金服用深度合作, 推动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部门之间的深度合作, 共同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平台, 包括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联盟等, 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建立

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发挥“科创中国”平台优势, 促进科学家和企业家合作, 推动优势技术项目转移和成果转化, 助力中小科技型企业可持续发展。

4.4 坚持协调发展, 推动包容性增长

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我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包容性发展, 就必须平衡好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

第一, 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問題。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高度专业化的技能要求, 受过良好教育或具备特定技术的人能够更好地从科技中获益。而缺乏这些技能的人可能被边缘化。我们应积极关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数字鸿沟和信息贫困^[24]问题, 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問題。为此, 建议加大对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入, 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培训机会, 帮助弱势群体和低收入家庭掌握一定的新技术和新技能, 提高就业竞争力。鼓励科技企业开发适合不同群体的产品和服务, 降低科技产品的使用门槛和成本, 推动科技产品和服务在弱势群体的普及和应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通过税收调节和收入再分配机制,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福利支持。加强对科技伦理的关注和监管, 防止科技滥用和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发生。同时, 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 规范科技企业的行为, 确保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促进包容性增长。

第二,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针对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 细化区域发展政策, 促进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 形成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格局。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 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 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加强区域间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区域间经济联系和合作。鼓励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展新格局,鼓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区域间市场一体化发展,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建立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利益平衡。

5. 结语

以Daron Acemoglu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我们应积极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史为鉴,结合国情,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利于创新的制度供给,坚持协调发展,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努力实现包容性增长,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责任编辑:李琦 校对:梁思琪 李世龙

参考文献

- [1] 陈永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揭开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迷雾[N].经济观察报,2024-10-14.
- [2] 樊朔.研究国家间经济不平等,三位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EB/OL].(2024-10-15)[2024-11-10].<https://www.mycailing.com/article/detail/532150>.
- [3] Acemoglu, D., S. Johnson, J.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91(5):1369-1401.
- [4] Acemoglu, D., S. Johnson, J. A. 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117(4):1231-1294.
- [5] Acemoglu, D., J.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M].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
- [6] Acemoglu, D., J.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M].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 [7] Acemoglu, D., S. Johnson. 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M]. London: Hachette, 2023.
- [8] Acemoglu, D.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 and politic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31(4):620-652.
- [9] Acemoglu, D., Cao D. Innovation by entrants and incumbents[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15, 157:255-294.
- [10] Acemoglu, D., P. D. Azar. Endogenous production networks[J].*Econometrica*,2020,88(1):33-82.
- [11] Dixit, J., Avinash, J.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297-308.
- [12] Acemoglu, D. 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113(4):1055-1089.
- [13] Acemoglu, D.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40(1):7-72.
- [14] Acemoglu, D., P. Restrepo.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108:1488-1542.
- [15] 陈沁涵.专访 | 麻省理工教授:担心AI成为将财富和权力转移至少数科技企业家的工具[EB/OL].(2024-06-16)[2024-11-3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723875.
- [16] Acemoglu, D., S. Johnson, J. A.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

Run Growth[J].*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05(1):385-472.

[17] Acemoglu, D., P.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20,128(6):2188-2244.

[18] Acemoglu, D. When does labor scarcity encourage innov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118(6):1037-1078.

[19] Acemoglu, D., Kremer M., Mian A. Incentives in markets, firms, and governments[J].*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2008,24(2):273-306.

[20] Acemoglu, D., D. Autor, Hazell J.,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jobs: Evidence from online

vacanci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22,40(S1): S293-S340.

[21] Acemoglu, D., Wolitzky A. The economics of labor coercion[J].*Econometrica*,2011,79(2):555-600.

[22] Acemoglu, D. 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AI[J].*Economic Policy*,2024(8):1-46.

[23] Acemoglu, D.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基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EB/OL].(2013-12-19)[2024-11-10].<https://www.cdrf.org.cn/jjh/pdf/178.pdf>

[24] 贺茂斌,刘小童.信息贫困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J].商业研究,2019(05):18-26.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and growth: The enlightenment of Daron Acemoglu's institutional research on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e Maobin¹, Liu Zheru¹, Zhang Bin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Notarial Office of Yicheng District, Zaozhu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277399, China)

Abstract: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4 is awarded to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for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 We summarizes Daron Acemoglu's main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and growth, analy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nd skill-biased technology in economic growth,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on labor markets and macroeconomics. Finall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s the core, we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focusing on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 supply,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policy guidance, and adhering t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Daron Acemoglu; inclusive institutions;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